

在文物旅遊中和行動者相遇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我在 2001 年開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研究的主題是中國旅遊。一開始是在上海，雖然蒐集到許多統計數字和相關研究文獻，說明中國的旅遊經濟有多紅火，但田野研究工作進行並不順利，於是考慮到旅行過的陝西或者雲南做研究。朋友介紹下，我認識了紐約某個博物館的策展人。這位策展人當時正在籌辦的，是向中國西北地區數個重要的博物館出借文物到紐約去做展覽，爲了這個大展，已經在中國進行多次的研究拜訪。我和他談到正在做和中國的旅遊有關的研究，他和善的介紹我認識了協助他在西北旅行的劉先生。劉先生在蘭州的旅行社工作，我們先在電話上簡要聊了一下，也許是因爲已經陪同紐約的策展人走過絲路幾個重要的考古點和博物館，他對文物旅遊的單位熟門熟路，似乎可以安排我去當地文物旅遊點作訪談，於是我決定先到蘭州、再到西安。

我到蘭州是 2001 年的夏天，住的旅館在蘭州市區天水路上，第一天早上我起早了，沿著天水路往火車站方向隨意走走看看，只見黃沙漫天，清潔工在掃街，馬路旁多半是兩三層樓的商店，有一些正在施工中的建築，路上看到一群群的回民、七八個藏族女孩背著行李，圍成一小圈站在路口像是商量甚麼……。我也坐了公車在蘭州市區繞繞，不到二十分鐘，似乎就出了市區，景觀開始很像農村了，黃泥路、草篷搭了幾個市場……，這些景觀和我待過的上海很不一樣。後來與某個受訪者閒聊時，他提到：中國的西北地區在歷史上一直和東南地區有著區域發展上的差異，而即使是改革開放後，西北地區在經濟發展與改革上都明顯「滯後」，不如東南地區。

到了蘭州我才知道，紐約這位策展人那幾天也在蘭州，所以劉先生正忙著陪同他準備文物出

國展覽相關事宜，沒法子招呼我；所以我自行聯繫了省的旅遊局和文物局。文物局接待我的是科級的幹部，人很年輕、對談間也很直率，我問到博物館現況，他馬上就能背誦出該省文物保護單位數量，其中多少是省級、多少是國家級文物、而可移動和不可移動的文物又各有多少等等，文物保護的資金數目也如同回答機智問答一般，能立刻回答，這讓我印象深刻。後來我拜訪陝西和寧夏的文物局時，見到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在某些時候，我還是會碰上官腔十足的文物部門的官僚，但遇到的多半都是實務上有能力、而且積極想了解外界情況的文物行政幹部，某些人甚至直接向我表達可否合作洽談安排文物出國展覽、或者希望我日後能寄給他們其他國家文物保護的制度法規……。這些具體的要求或模糊的好奇，都展現了這些在地的文物行政部門向外交流的積極與渴望。

我在城裡待了幾天，把旅遊局、文物局、學術單位都拜訪完了，黃河 40 公里風景線和白塔山也都逛過了，又再去找劉先生，他還是走不開，但他是旅行業的，擅長安排行程，於是他很快的就找了車拉我去臨夏和甘南看看，經過山區時開車師傅告訴我這裡有國家一級扶貧區、那裡正在作休耕還林，去了炳靈寺石窟、拉卜楞寺、還去甘南草原上的藏族家裡騎馬喝茶，這些並不是一般熱門景點或常見的大眾團客套裝行程。回到蘭州後，劉先生剛把紐約文物展覽的事忙完，他大概很不好意思，於是找我看能怎麼幫我的忙，我就先約了他訪談，在訪談時他告訴我：與中國的東部相比，到甘肅旅遊的海外遊客並不算多，約 20 多萬人左右，其中主要是日本客，台灣客居次，而這些海外遊客到甘肅來，主要是去莫高窟這樣的著名文物景點。另外，劉先生掛靠的旅行

社，原來是國營企業，但這幾年甘肅省內這些國營的旅行社業開始進行股份改造，原來是省旅遊局下屬企業單位的旅行社或賓館，開始與旅遊局脫勾，透過各種方式改制，其中有幾家旅行社開始與外省或境外的資本洽談中，希望成為合資企業，西北地區大約也是在那幾年才開始出現旅遊集團化的現象。似乎因為經常翻譯陪同像紐約博物館策展人這樣特殊的旅行者，因此劉先生已經自行組合出一些不一樣的行程安排，他認真向我說明他有能力可以安排深度文化之旅：走河西走廊看博物館

和歷史名城、或者走絲路……，並且很巧妙的提議我回台灣之後可以與他合作、或是幫他建立合作關係，推廣這樣的深度文化行程。我好奇所有在國企（改制中）旅行社裡工作的導遊都像劉先生這樣有能力嗎？答案是否定的，劉先生掛靠在國企（改制中）的旅行社裡，但他長期作外國遊客的陪同翻譯，而且後來接待的往往是有獨特需求的旅行者，在他身上我看不到吃大鍋飯的思維，而是靈活動員自己的經驗和在地資源把事情辦成的能力、並且尋找機會的企圖。

當我請劉先生幫忙安排拜訪遊客常去的文物單位，他提議我可以去寧夏、甘肅等幾個重要的考古單位或博物館拜訪，他幫我打了一兩通電話，其餘的部分雖然要我自行聯繫，但他給了一些應該如何打電話約訪談的具體建議，讓我非常受用，我於是便開始了一連串博物館拜訪的行程。我第一個文化震撼，是在拜訪某個省級的博物館時，這個博物館的文物陳列方式非常傳統，制式的展櫃裡放著文物和說明，這樣的陳列和我參觀某些資源較少的省級博物館基本上大同小異，只是，解說員用制式的方式介紹完文物之後，讓我們先等一等，說是有表演，沒多久就看到她換上少數



在博物館中的少數民族舞蹈表演。

民族服飾、在文物展櫃前跳著少數民族舞蹈，跳完舞之後還與我們這些參觀者合影留念。當時我第一個念頭是：這個博物館怎麼會像旅遊民俗村一樣，安排歌舞表演節目並供遊人拍照？在後來的田野中我發現：許多紀念館、遺址地、或者是歷史聚落，也都有各種各樣的表演，這是由於中國旅遊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在大眾旅遊造訪下，某些文物博物館單位，或者是在遺址地上有旅遊經營權的企業，試圖突破以往的宣傳教育的模式，創新發展出各種表演節目，來吸引觀光客的凝視和旅遊造訪相關收入。

在博物館或者遺址地上看到歌舞表演，為什麼會讓我感到驚訝呢？什麼是博物館或者遺址地上「應該」進行的活動呢？我在博物館目睹少數民族舞蹈表演之後，問了自己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後來又幾度被修改，特別是當我在西北的博物館之行中，注意到博物館門口的幾塊牌子之後。

在我的西北地區博物館之旅中，有些時候我在入口處向警衛交了介紹信後，不一定能直接穿門踏戶的走進博物館某個科室找我的訪談對象，而是必須待在入口處等訪談對象出來接我進去，所以常常有機會在入口處停留。我注意到，許多

的博物館入口處懸掛著好幾塊牌子，或是「某某省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或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是「國家5A級旅遊景區」，還有極少數掛著「世界遺產」。我不曾在美國或者台灣的博物館門口看到類似的現象，因此引起我的好奇：這些不同的牌子是甚麼意思呢？我上網查詢、或者訪談時詢問受訪者，得知這些牌子是由不同的系統指定掛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定的某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地點，包括各類博物館、紀念館、紀念建築、文物保護單位、歷史遺跡等場所，根據「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在這些地點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內容包括中國近代史與黨史、國家文化遺產、以及「黨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的教育……，使人民群眾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國情教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教育、國防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民族團結教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教育等等。簡言之，是黨的意識形態機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則是由中國國家文物局核定，對於不可移動的文物實施保護管理分類中的最高保護級別。而「世界遺產」則是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通過，登錄於世界遺產名單中，視為人類共同且無可取代之遺產的遺跡、建築物群、紀念物，或自然環境等。至於「國家5A級旅遊景區」，則是中國國家旅遊局批准，在交通、導遊、衛生方面達到一定旅遊接待標準的景區。

這些不同的牌子展現的，是不同的行動者透

過掛牌，與博物館或遺址地進行不同的意義詮釋、或指定不同的空間功能。這些行動者，包括不同的國家部門、黨宣傳機器、文化保護的跨國組織。因此，在現實中的中國博物館的意義與功能，就不能僅從教科書上規範式的「典藏、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來理解，而必須放在特定的制度脈絡下來思考，為何這些行動者都可以、也都想要來此掛牌指定博物館的意義與功能？為何同一個機構所在地，有如此多重的意義和功能附著其上？博物館為什麼可以是黨的意識形態機器？博物館可以做為旅遊設施嗎？博物館要保護的文物、到底有甚麼價值？博物館中的解說員（或者其他成員），到底有哪幾重的身分？我這樣的局外人感到驚訝或質疑在博物館發生的各種事，無論是少數民族歌舞或仿古表演、還是門票的訂價與使用方式，是在怎樣的在地脈絡下成為可能？

西北的博物館之旅，讓我開始注意中國的文物所有制，而我在西北做研究時，正好是陝西文物體制改革引發爭議的時期，因此我開始注意旅遊經濟下的文物體制改革問題，以及這個問題中，地方政府、旅遊集團、文物專家及文物行政官僚這些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這些經驗現象下，我好奇的是：歷史之物所在的空間成為旅遊景點的過程中，哪些行動者涉入其中？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回應文化商品化的力量？文化旅遊發展帶來行動者之間怎樣的衝突與協商？

這些研究的提問和分析軸線的形成，都得感謝我在西北的文物旅遊中遇見的諸多行動者。

